

长寿时代下的积极老龄观： 演进脉络、内涵要义与实践优势

陆杰华

摘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昭示着中国开启了长寿时代，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也是积极老龄观新理念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积极老龄观既融入了长期以来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国际共识，更凸显了中国语境下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老龄观无疑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重要转向，其中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和怎么干的概括凝练。当然，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将面临着结构、视角与公共的三重持续挑战。为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与总体框架，最终彰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国力量。

关键词：长寿时代；积极老龄观；内涵要义；三重挑战；实践优势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2.04.009

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从人口年龄结构嬗变到老龄社会，再到长寿时代的人口变革，不仅是我国生产力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推动社会发展与增进人民福祉的重大成果。中国的长寿时代具有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人口比例增大与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等鲜明特点。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呈现同步速度加快的突出特点，但是整体态势却仍然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2.64亿人和1.9亿人。以这两个口径看，全国老年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8.7%和13.5%。在人口老龄化的新的基本国情中，高龄化既是长寿的一个主要标志，同时引发的持续挑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占13.9%。从发展态势上看，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十四五”末期突破3亿人，并持续增长至本世纪中叶达到4.9亿峰值。《世界人口展望(2019)》报告指出，全球正在经历老龄化过程，2019年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9.1%，同期我国这一数据为12.6%，2021年上升至14.2%，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中等老龄化阶段。相对而言，与2019年欧洲和北美地区18%的老龄化水平相比，我国老龄化程度仍然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及医疗条件有效改善，我国平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正在逐渐接近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如图1所示)。从1982年的67.9岁，到2001年的71.7岁，再到2019年的77.3岁，这一数值比2015年提高1岁，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水平^①。分性别来看，《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0ZDA32)。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lujiehua@pku.edu.cn)。

^① 申少铁：《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 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人民日报》2021年8月9日，第2版。

2020年)》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至80.88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出4岁。此外,《“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预测,至2025年“十四五”结束时期,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3岁;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预计203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将突破79岁。

表1 2001年至2019年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及其他收入水平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年)

年份	中国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世界平均水平
2001	71.73	77.90	70.86	66.66	53.90	67.82
2002	72.01	78.03	71.11	66.94	54.49	68.07
2003	72.38	78.16	71.37	67.22	55.11	68.33
2004	72.69	78.57	71.66	67.53	55.77	68.65
2005	72.99	78.67	71.92	67.83	56.44	68.92
2006	73.27	78.98	72.26	68.18	57.13	69.26
2007	73.55	79.22	72.58	68.52	57.82	69.59
2008	73.84	79.37	72.86	68.86	58.50	69.90
2009	74.12	79.75	73.19	69.22	59.14	70.25
2010	74.41	79.83	73.47	69.56	59.74	70.56
2011	74.71	80.07	73.81	69.91	60.30	70.88
2012	75.01	80.19	74.11	70.25	60.83	71.17
2013	75.32	80.36	74.44	70.57	61.32	71.47
2014	75.63	80.62	74.71	70.86	61.79	71.74
2015	75.93	80.50	75.00	71.14	62.23	71.95
2016	76.21	80.64	75.27	71.40	62.65	72.17
2017	76.47	80.68	75.53	71.65	63.03	72.39
2018	76.70	80.79	75.75	71.86	63.39	72.57
2019	76.91	80.89	75.95	72.06	63.73	72.7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发展”数据指标。注:以人口出生时为计算起点;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长寿时代既是21世纪全球必须面对的新社会形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情、新变局与新发展。老年人口比例提高与平均预期寿命提升共同塑造着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老龄社会与长寿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人口红利不再由年轻型年龄结构所制约,老年人口发展数量与质量决定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新型人口红利的发展可能及其未来走向。长寿时代的发展方式、生产方式与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变化逻辑:生存发展不再局限于死亡的风险,社会意识跨越了年龄的制约,行为准则开启了共享的秩序,体制机制进入了改革的深化。进一步从理论上来说,有学者以1960年至2016年84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检验,健康预期寿命主要通过“人口、储蓄、教育、劳动/闲暇和技术进步”五个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①。也有学者以1996年至2017年世界121个主要经济体数据,论证全球人口老龄化并非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预期寿命延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②。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不同国家在老年人口结构转型与经济社会发

① 张颖熙、夏杰长:《健康预期寿命提高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② 许光建、许坤、卢倩倩:《预期寿命延长促进经济增长了吗——基于全球121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3期。

展的实践路径差异,主要来自打破体制性结构壁垒与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①。也就是说,无论是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探索,还是老年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与开发^②,核心都在于重新看待长寿时代老年人口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

自开启长寿时代以来,积极老龄化不仅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同时也被视作各国老龄公共政策核心理念和基础。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最早对积极老龄化概念的形成、理论基础以及积极的老龄化政策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③。伴随着21世纪初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学界开始对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内容与目标进行探索研究^④,有学者开始探讨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架^⑤。近年来,有研究指出,积极老龄化“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核心要义不仅在于建构学理性的研究体系,更重要的是将积极老龄化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项公共政策之中^⑥。此后,诸多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制度理念及其实现路径^{⑦⑧}。伴随着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更多的研究则聚焦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内涵、目标和任务上^⑨。

随着中国开启长寿时代以及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国家顶层制度设计者更加注重从积极、主动、前瞻的理念把握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机遇期,化解其引发的诸多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⑩“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毋庸置疑,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国家战略理念,成为老龄社会新常态下中国释放长寿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的基本规律与实践立场。“积极老龄观既是一种新理念、新态度,也是一种新行动。树立积极老龄观,就要用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⑪积极老龄观的理念革新将为长寿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寿时代中所具备的积极老龄观越是与时俱进,就越是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便是,联合国以平均预期寿命作为评价世界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指标,即列居三大核心指标的第一位。在共同富裕的长寿时代下,老龄社会发展进程不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理念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发展的积极态度和创新理念。其根本原因在于,积极老龄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老龄社会、改造老龄社会的行动意识与实践能力。积极老龄观的新内涵、新格局与新路径将成为长寿时代下中国老龄社会新常态最能动的新引擎。有鉴于此,本研究重点以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根基,进一步厘清我国积极老龄观的演进脉络、内涵要义与实践路径,为长寿时代下全球老龄共同体的公共治理谋划“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二、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积极老龄观演进脉络

在任何时代,每一个人自从出生,在年龄增长中走向死亡,都是一种自然且本源的生命过程。有

① 汪伟、王文鹏:《预期寿命、人力资本与提前退休行为》,《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② 汪伟、王文鹏:《预期寿命、养老保险降费与老年劳动供给:兼论中国退休政策改革》,《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

③ 郭爱妹、石盈:《“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④ 王树新:《北京市人口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4期。

⑤ 邹沧萍、王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求是》2009年第9期。

⑥ 刘文、焦佩:《国际视野中的积极老龄化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⑦ 陆杰华、郭冉:《从新国情到新国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⑧ 李连友、李磊:《构建积极老龄化政策体系 释放中国老年人口红利》,《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8期。

⑨ 林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涵、目标和任务》,《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3期。

⑩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4日,第1版。

⑪ 吴玉韶:《树立积极老龄观 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第5期。

别于个体的老化态度,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肇始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后续世界多个国家大规模的老龄社会进程。这场人类历史上静悄悄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个体生老病死的固有看法,在老年学、人口学、生物学及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综合中形塑现代社会的积极老龄观,并深刻影响着长寿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老龄化的国际共识推动积极老龄观的产生与发展

积极老龄观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历史进程,这与人类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历程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积极老龄观这一知识形态的兴起与老年科学新发展、老龄社会新形态以及长寿时代新格局是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交织的过程。在老龄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积极老龄观的价值理念始终推动着人类追求更加长寿与更加健康的生命轨迹,这种理念性与制度化力量进一步助推全球加速老龄化。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构,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再是被支配、从属或者边缘的社会角色。在此宏观背景下,积极老龄观以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全生命周期、代际公平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为指导全球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①。

回顾发展历程,积极老龄观孕育于学术界、实践界与政策界共同对人口老龄化的模式探索与整体干预。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利时国际老年学学会的成立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对于积极老龄观的研究起点,学者们开始在老龄研究的问题视角中思考其可能蕴藏的积极方面^②。可以认为,学者们在探究如何评价老年人患病程度、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以及相应的生理心理功能的过程中逐渐感知到积极老龄观的端倪或原点^③。然而,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报告中仍不乏“衰老”“负担”等危机意识,积极老龄观尚未真正完全形成。虽然1982年联合国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疾病”“照料”“保障”为视角强调对老年人的照顾与保护,但是可以说仍是一种将老年人视为弱势群体的传统理念延续。直至1987年,《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一篇题为《人类老龄化:普遍而成功》(Human Aging: Usual and Successful)的论文^④。这一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明确指出,人类正在经历的老龄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历程,应当将其看作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成功的重要标志;并且进一步驳斥了既往研究中对于衰老过程的负面看法,强调饮食、锻炼、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等老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至此,国际社会逐渐摒弃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危机、负担或包袱的传统观念或消极态度,相继以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以及积极老龄化认识与理解人口老龄化。1997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首次将人口老龄化作为最主要的国际问题予以讨论,“积极老龄化”作为政策主张首次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讨论范畴,由此开启了以积极老龄观倡导国际行动的先河。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参与”“保障”与“健康”作为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进一步强化积极老龄观的全球共识,并在《马德里宣言》与《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谋划相应的行动方案。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以“贡献”“功能发展”和“多样化”等优势视角与价值理念再度拓展与丰富积极老龄观的主旨内涵。

(二)中国语境下的积极老龄观形成

作为崇尚长寿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出以尊老为德、敬老为美、爱老为善与助老为乐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氛围,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老龄观的本色。正如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看望老年群众时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

① 陆杰华、汪斌:《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② Havighurst R., Albrecht R., *Older Peopl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3.

③ Katz S., et al., “Studies of Illness in the Aged The Index of ADL: A Standardized Measure of 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63, 12, pp.914-919.

④ Rowe J., Kahn R., “Human Aging: Usual and Successful”, *Science*, 1987, 10, pp.143-149.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比照“老当益壮”“老骥伏枥”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自古以来形成的衰老个人经验与尊老爱老孝老的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积极老龄观在吸收和借鉴国际共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有效应对”,更加注重“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在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弘扬孝老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基本战略与中国老龄工作伟大实践经验结晶的有机结合,中国语境下的积极老龄观极具鲜明的创新理念。

一方面,从政策沿革的历史担当理解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形成更具战略性,强调在中国语境下描绘中国方案。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老年权益保障、老龄事业与产业、老年社会服务等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但是严格来讲,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形成起始于21世纪初期。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此为开端,积极老龄观逐渐发展为我国老年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与政策基础^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以积极老龄观为根本遵循,先后密集出台涉老政策与相关制度300余项,并启动多个老年专项行动计划^②。2020年底,中国积极老龄观演化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从社会观念到国家战略,中国积极老龄观在历经20余年的演化进程中得以真正形成,成为塑造长寿时代下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的核心理念。

另一方面,从老龄工作的具体安排阐释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建构更具实践性,凸显中国语境下凝聚中国智慧。从针对劳动力就业结构性风险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到老年群体的收入风险与老年贫困的精准扶贫战略与养老保障制度,再到针对老年期和老年人口的疾病风险的老年医疗保障与医疗救助,以及针对老年人失能失智风险的长期照护试点与服务津贴制度,还有针对老年家庭发展能力和新社会风险的老年赡养扶老政策与优待照顾制度,中国积极老龄观在老龄工作的创新实践与大胆尝试中得以全面建构^③。中国积极老龄观真正履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秩序,为“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的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奠定释放长寿红利的创新型智慧。

三、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及理念转向

积极老龄观关乎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转向。这一理念的嬗变与更迭是由中国人口基本国情的具体状况和所处的经济社会具体环境及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积极老龄观的首要内涵就是“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④。作为长寿时代下老龄社会新形态的主导观念,积极老龄观兼顾工具理念与价值理念。2021年年底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始终以“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作为主题主线贯穿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与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与指示深刻揭示了积极老龄观的深刻内涵,是党和国家正确认识、科学谋划老龄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积极老龄观进一步阐明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精义和要旨,吹响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集结号,不仅奠定了中国老龄工作的主基

① 杜鹏、陈民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演进与国家战略实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陆杰华:《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构想》,《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党俊武:《十个关键词解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老龄科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④ 《习近平: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agt=5, 访问日期:2022年1月12日。

调,同时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必将开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纪元^①。

从社会观念与知识形态的角度看,长寿时代下的中国积极老龄观先后经历了经验形态的社会认识、原理形态的学术认知以及战略形态的政策认同三维历程。可以认为,中国坚持积极老龄观的基本价值、根本立场与发展遵循,既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价值原则和取向,也指明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国家战略的部署方向。积极老龄观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理念与重要内容,凸显了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积极”的新理念,就是“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②。实际上,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与怎么干的概括凝练。

首先,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第一层内涵要义在于对人口老龄化“怎么看”。中国积极老龄观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关于老龄工作的思想结晶,既体现在从“老人问题”向“发展问题”再向“全局性问题”的认知转变之中,也表现为我国老龄政策经历从特惠到普惠、从保基本到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转变之中^③。中国共产党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决策力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方位、发展定位与实践本位。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从悲观到乐观、从包袱到财富、从危机到机遇,从负债到红利……中国积极老龄观不断在老龄工作的实践活动中摸索、验证、总结与创新。积极老龄观的理念变革摆脱了人们对生理年龄增长的恐惧,将老年人从消耗品的负面视角中解脱出来,为人类长寿彰显了存在的尊严与意义,使长寿红利回归到代际公平和代际发展的现实中来。

其次,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第二层内涵要义在于对人口老龄化“怎么办”。为适应长寿时代积极老龄观的理论创新与智力支撑,中国涉老相关学科及研究学者,共同成为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理论的创建者、中国老年社会问题的剖析者、中国迈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的诠释者、中国实施积极老龄化国家方案的提供者^④。我国积极老龄观在理论建构创新、基础研究夯实、研究问题转向、学科交融推进、数据平台支撑以及政产学研结合的有利境遇中,进一步认识与阐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本质、客观制约与发展条件。

再次,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第三层内涵要义在于对人口老龄化“怎么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⑤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与价值主体围绕老年群体的多维需求互融互嵌,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聚焦老年以及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互构互化。可以认为,中国老龄工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长寿时代积极老龄观的价值判断中被充分调动与激活。

长寿时代下中国积极老龄观不仅支持了老年社会保障体系、老年养老服务体系 and 老年健康支撑体系等老龄工作支柱体系的有序建构,而且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带来了四个方面的理念转向。一是从关注老年人或老年阶段转向全人群、全过程与全生命周期。积极老龄观拓展了对于老龄问题的理解层面与判断尺度,既关注老年人与老年阶段的特定问题,也关注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从求学到就业再到退休的生活过程,进而实现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全龄、全时与全域的高度统一。二是从聚焦救急转向提前预防。既往老龄工作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对象纳入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老年医疗救助或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范围作为主要方向,积极老

① 王深远:《吹响新时代老龄工作集结号》,《中国社会工作》2021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agt=5, 访问日期:2022年1月12日。

③ 杜鹏、谢立黎、王煜霏:《中国共产党老龄工作的思想与政策演变——百年历程的回顾与思考》,《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5期。

④ 朱荟、陆杰华:《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⑤ 《习近平: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重大政策制度 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3/c_1118132709.htm, 访问日期:2022年1月12日。

龄观将提前预防的新社会理念与行动策略运用到长寿时代老龄工作中来,以预判趋势、消除诱因到化解风险为思路的社会预防理论重新定位长寿时代我国老龄工作重点。三是从强调事后转向注重事前与事中。积极老龄观以新时代人民对老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将长寿时代老龄社会新形态表述为人类发展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将事后的问题解决置于底线,将事前与事中的全面发展权利视为根本。四是从着重化解社会风险转向主张重新发现机遇。积极老龄观致力于化挑战为机遇,重新审视老龄社会的劳动力供给风险、老龄健康风险和国家人口安全风险等危机方面,将快速增长的老年人群体视为不断增强的“增长驱动力”,深度发掘长寿时代下中国老龄社会的潜藏价值。

四、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的三重挑战与实践优势

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出多种关于年老、衰老、敬老、孝老与养老的礼俗文化,例如形容家庭事务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包括刻画劳动领域的“劳其身者长寿,安其乐者短命”,以及描述老化态度的“树老果不多,人老心不老”。这些经典谚语或俗语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老龄观所蕴含的积极文化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老龄观的变化史,归根结底就是在人们寿命逐渐延长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史。如果说平均预期寿命较短却又十分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以推崇老年人生产生活经验为实用老龄观的主要方面;那么,在短期内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到低出生、低死亡人口转变的工业社会,则因为年轻劳动力在规模上的迅速增长与在技能形成上的快速习得,而发展出较为消极的老龄观。随着信息革命与新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工业化所要求的液态智力与体力劳动不再适用,不同的社会技术介入使得老年人所擅长的结晶智力与经验阅历变得亦有重新参与并融入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可能。在后工业社会的长寿时代,积极老龄观正朝向社会公正与代际平等的方向发展。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种更加理解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新理念,全社会践行积极老龄观仍面临三重现实挑战。

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所面临的第一重现实挑战在于结构困境。从社会知识传播与实践的内在机制上看,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传播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其在权威性政治话语体系中结构化的表征^①。所谓“结构”指的是结构的性质,按照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就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使用到的规则和资源”^②。从反映老年人口规模、趋势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人口结构,到描述老龄社会新形态社会成员日常行为规范的社会结构,再到呈现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结构,长寿时代下中国积极老龄观所隶属的结构体系正在逐渐走向社会政治结构的最高级层面。必须承认,虽然积极老龄观已经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价值范式,但是在公共意识和社会意义上仍未突破既有结构性的瓶颈制约,尚未形成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构秩序。

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所面临的第二重现实挑战在于视角困境。相比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进入老龄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却发展速度较快。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理念上,往往以西方国家的国别化经验或国际社会的通用性思路为比照、参考与借鉴。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一定有其共性,但是每一个国家在具体应对策略上只能基于自身国情。有学者称,这种“拿来主义”的视角困境,往往忽视了中国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特殊性甚至优势^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

① 杜欣:《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理论导刊》2019年第7期。

②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71页。

③ 胡湛、彭希哲:《对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及政策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是这样的新国情、新变革与新图景,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鲜明面向是不可复制性,包括规模大、速度快、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等。因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需摆脱西方借鉴的视角困境,需要在中国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老龄社会建设的基本特征、价值意义与政策体系^②。

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所面临的第三重现实挑战在于公共困境。虽然我国人口老龄化处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及“慢备快老”的发展阶段中,相关制度安排与社会服务尚未做好足够的准备,但是这种对老年人与老龄化的消极乃至悲观的社会情绪,并不仅仅源于制度设计的不到位,更在于公共意识的缺乏。之所以践行积极老龄观面临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忽视或者说是较为片面地理解老龄问题的社会公共意义。事实上,人口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不是生育率与死亡率双双降低的数量问题,也不完全是人口年龄结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劳动力问题,更不是仅仅关于老年人这一特定群体的养老或者健康问题。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是国家战略定位下事关国家繁荣与民族复兴的公共概念、公共思想与公共范式。只有充分理解积极老龄观的历史传承性、人群差异性与公共价值性,才能将其塑造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流社会观念,从而唤醒社会共同体意识,以维护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社会公共秩序。

进一步从社会理念的功能与结构、先发与后发以及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思路,构建长寿时代中国践行积极老龄观的实践优势。面对结构困境、视角困境与公共困境三重现实挑战,中国践行积极老龄观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与总体框架。

首先,就制度优势而言,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始终将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深度结合,这种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国家治理结构,有利于践行积极老龄观突破结构困境。与过去分散解决老龄健康问题、劳动力供给问题、养老金收支平衡问题,以及老年人经济赡养与精神慰藉问题等老龄工作补缺性的传统思路相比,践行积极老龄观需要强大的集中动力与综合国力。中国无疑具备了这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正逢其时。

其次,就后发优势而言,在人口老龄化的全球性趋势下,中国在认识反思先发国家的老龄化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可以跃过先发国家的一些不必要的发展阶段以及避免可能走过的弯路或者教训,在社会能力、技术水平与制度创新等方面充分具备的条件下,以赶超意识形成优势合力,进一步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老龄政策体系。可以认为,中国积极践行积极老龄观赶上了这一轮后发优势,在独立、开放与自主的思想氛围中,形成对于理解与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加灵活且综合的社会知识场域。从实施老龄化国家战略,到消除老年绝对贫困的精准扶贫,再到老龄社会信息技术领域的领跑,中国践行积极老龄观已经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视角困境,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人口又多又老又穷的叙事框架,为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持续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

最后,就规模优势而言,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都在急速增长的社会事实,还是“人人都会老去”的自然规律,积极老龄观不设置群体分异与无关利益博弈的价值立场,势必冲破保守与刻板的公共困境。在整体社会环境下消除年龄歧视,须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老龄国情教育,为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全龄人口发展增能赋权。虽然积极老龄观不以强调老年人口增多为现实逻辑,但其规模优势的本质在于,当一个社会中老年人越来越多,今天的年轻人变成了明天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认可与接受必将增强;反过来,积极老龄观的公共性又将推动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从规模优势转换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访问日期:2022年1月12日。

② 原新、李志宏、党俊武等:《中国老龄政策体系框架研究》,《人口学刊》2009年第6期。

为发展优势,将成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

当下中国与世界都正值百年未有之变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局毫无疑问来自长寿时代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改变,践行积极老龄观的理念变革与实践创新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动力之一。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作为一种“元理念”或者“元观念”的社会知识形态,在诸多老龄相关的社会意识与态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具有奠基性作用。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应践行积极老龄观,贯彻长寿时代下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口与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格局赢得更大的“人口机会窗口”效应,开创中国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n the Era of longevity: Evolution,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Advantages

Lu Jiehu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R.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all the demographic data turn out that China is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era of longevity. In fact,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sion of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not only indicate that China has opened the era of longevity, but also jointly shape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On one h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ra of longevity, active aging has not only gradually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been regarded as the core concept and foundation of national public policies on aging.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hina's basic strateg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great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aging work, the positive concept of ag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a distinctive innovative concept. In this sense,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s undoubtedly the major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a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how to think,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 with population aging, which is also a major conceptual shift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n the long-lived era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s now developing towards social justice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 Of cours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n the age of longevity will face a triple challenge: structure, perspective and public. Therefore,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urgently needs to build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overall framework of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age of longevity with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lat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scale advantages, and finally China's pow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population aging will be demonstrated.

Keywords: Era of longevity;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Connotation; Triple challenge; Practical advantages

[责任编辑:陆 影]